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

Dunhuang Xieben 《Kaimeng Yaoxun》 Yanjiu

張新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

Dunhuang Xieben 《Kaimeng Yaoxun》 Yanjiu

張新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研究 / 張新朋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500 - 6

I. ①敦… II. ①張… III. ①古漢語 - 敦蒙讀物②《開蒙要訓》 - 研究
IV. ①H194. 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52165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官京蕾
特約編輯 李曉麗
責任校對 何又光
責任印製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國社科網 010 - 64070619
發行部 010 - 84083685
門市部 010 - 84029450
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奧隆印刷廠
裝 訂 北京市興懷印刷廠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19.75
插 頁 2
字 數 331 千字
定 價 58.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010 - 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例

一、本書所涉及的敦煌文獻資料，一般據《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書中“P.”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伯希和（P. Pelliot）編號；“S.”指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斯坦因（M. A. Stein）編號；“Дх.”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編號；“Ф”指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弗魯格（Флук）編號；“北”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北新”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新編號，“BD”則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統編號。

二、引用敦煌文獻時，全部標明卷號，如：P. 2578、S. 5431、Дх. 2655、BD14667（北新867）、北5995（菜19）。對於同一號下有多種文獻者，用A、B、C……分別標明，如P. 3875A，表示所引文獻為該號所含文獻的第一部分，至於P. 3875A下的社司轉帖、《開蒙要訓》兩種文獻，引用到者則徑稱所引文獻題名，不再分別編號，如P. 3875A號社司轉帖、P. 3875A號《開蒙要訓》。所引文獻位於寫卷背面者，則於卷號後加“V”（verso的首字母），如S. 2263V、P. 2249V。對於所引文獻抄於碎片上者則以p、p1、p2……表示之，如P. 3875Ap7、P. 5031p21。對於可以綴合的寫卷，用“+”號表示前後相接，如Дх. 19083 + P. 3243、P. 2717B + Дх. 5260 + Дх. 5990 + Дх. 10259。

引錄敦煌文獻時，缺字用“□”號表示，缺幾字用幾個“□”；缺字據上下文、文意或異本補出時在缺字標記後用圓括號注明，如“鴻鸞□□（鳳凰）”。文字模糊不清或僅存殘跡，用“▨”號表示。殘缺字數不能確定者，上部殘缺時用“□”號、下部殘缺時用“□”號、中部殘缺時用“□□”號分別表示。倒字、衍文據文意或原卷的乙正、刪除符號

加以乙正或刪除，必要時出校加以說明。引文有錯誤者，於誤字後的校訂文字上加“（ ）”號表示，如“費人依（衣）食”。脫字可補出者，於所補文字上加“〔 〕”號以表示，如“太平興〔國〕三年”；難以補出者用“〔□〕”表示，如“學郎身姓〔□〕”。

對於《英藏》、《法藏》、《俄藏》等圖錄文獻不具題名或是所定題名不能準確反映寫卷所包含文獻內容的部分寫卷，筆者或酌情改定。

三、引用其他文獻時，本書採用腳注注明責任者、書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頁碼等信息。同一頁所引文獻相同且注釋序號相鄰時，責任者、書名省略為“同上書”。

引文中的俗字異體，若非關涉到所在條目的考證，則一般改為通行的規範漢字。

四、上編所引《開蒙要訓》文句，若非特別加注卷號，則均出自下編以 P. 2578 號寫卷為底本校定的文本（個別情況略作變通）。

五、為求行文簡潔，本書引用前修時賢的研究成果皆直書其名，不綴“先生”字樣，敬請諒解。

六、下列論著徵引較多，文中用簡稱，對應關係如下：

《英藏》——《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

《法藏》——《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俄藏》——《俄藏敦煌文獻》；

《上圖》——《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

《國圖》——《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翟目》——[英] 翟理斯（Lionel Giles）《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

《金目》——金榮華主編《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錄提要》；

《榮目》——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

《孟目》——[俄]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

《索引》——《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索引新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

《黃目》——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

《裴韻》——故宮舊藏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王一》——P. 2011 號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王三》——故宮舊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匯考》——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
《說文》——《說文解字》；
《龍龕》——《龍龕手鏡》；
玄應《音義》——玄應《一切經音義》；
慧琳《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

目 錄

上編 通論篇

第一章 唐五代時期敦煌的教育	(3)
一、濃厚的重學氛圍	(4)
二、不同的教學層次	(10)
三、豐富的教輔材料	(16)
第二章 《開蒙要訓》概述	(18)
一、作者與時代	(18)
二、形式與內容	(19)
三、研究的回顧	(22)
第三章 《開蒙要訓》的研究價值	(27)
一、有助於敦煌文獻的整理	(27)
二、有助於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	(30)
三、有助於大型字書的編纂	(34)
四、有助於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	(38)
第四章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敘錄	(44)
第一節 《開蒙要訓》寫卷敘錄	(44)
第二節 《開蒙要訓》傳抄體系	(61)
第五章 《開蒙要訓》的寫本特徵	(69)
一、抄寫人員及抄寫年代	(69)
二、抄寫類別及抄寫形制	(70)
三、抄寫質量及殘損狀況	(71)
第六章 《開蒙要訓》異文研究	(74)
第一節 《開蒙要訓》異文概述	(74)

第二節 《開蒙要訓》異文分類	(76)
一、因形而異	(76)
二、因音而異	(100)
三、因義而異	(112)
四、因上下文而異	(116)
第三節 《開蒙要訓》異文之價值	(119)
一、有助於原書的校理	(119)
二、再現當時用字之情形	(122)
第七章 《開蒙要訓》與《千字文》	(124)
第一節 《千字文》概述	(124)
一、作者與時代	(124)
二、敦煌本《千字文》敘錄	(126)
三、敦煌本《千字文》的特點	(158)
四、敦煌本《千字文》研究概述	(160)
第二節 《開蒙要訓》與《千字文》之比較	(161)
一、收字用韻	(161)
二、內容層次	(163)
三、對後世的影響	(165)
結語	(170)

下編 校錄篇

校例	(175)
開蒙要訓一卷	(177)
附錄 《開蒙要訓》圖版	(260)
主要參考文獻	(293)
後記	(304)
修訂記	(307)

上編

通論篇

第一章

唐五代時期敦煌的教育

有唐一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繼漢代後的又一個黃金時代，這一時期我國的封建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均走向全面的繁榮。教育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重要基礎之一，一開始就受到李唐王朝的重視。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①；武德三年（620），時為秦王的李世民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武德七年（624），唐高祖親臨國子學行釋奠禮；貞觀二年（628），“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②。這一系列的措施，標誌著唐代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實施。教育制度上，唐承隋制，官學分中央學校與州郡地方學校兩個層次。中央學校包括國子監統轄的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門下省的弘文館、東宮的崇文館、太醫署的醫學、祠部的崇玄學及為宗室功臣子弟而設的小學。州郡地方學校據行政等級不同設有府學、州學、縣學，由長史主管；各州府亦有醫學與崇玄學之設^③。

在這種大的背景下，敦煌——古代東西交通的樞紐，向內可達長安、洛陽，向外有南、中、北三道分別可達印度、地中海沿岸和羅馬——自古便是華戎交會之所，東西文明碰撞之地，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同時，其教育文化事業亦甚發達。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傳世文獻雖乏載錄，但敦煌文獻為我們保存了數量衆多、可供我們探尋此時敦煌地區教育面貌的珍

①（後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第15冊，第4940頁。

②（唐）吳兢編著：《貞觀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頁。

③有關唐代官學設置的具體情況，參見《新唐書·選舉志》〔（宋）歐陽修、宋祁等修撰，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第4冊，第1159—1160頁〕、《唐六典·國子監》〔（唐）李林甫等撰，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55—566頁〕之相關記錄。

貴材料。具體而言，敦煌的教育具有如下特點：

一、濃厚的重學氛圍

“敦煌設立學校，大概是從西漢設郡之後開始的”^①。至十六國時期，相繼統治敦煌的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雖政權上屢有更迭，但重視教育的文教政策大抵前後相沿，此時敦煌的學校教育已較為興盛，為以後敦煌地區教育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②。及至唐代，在統治階級興學重教政策引導下，州學、縣學等官學在敦煌地區均有設立，如 P.2005 號《沙州都督府圖經》載：

州學 右在城內，在州西三百步。其學院內，東廂有先聖太師廟堂，堂內有素（塑）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縣學 右在州學西連院。其院中，東廂有先聖太師廟堂，內有素（塑）先聖及先師顏子之像。春秋二時奠祭。

醫學 右在州學院內，於北牆別構房宇安置。^③

又，P.5034 號《沙州地志》載壽昌縣云：

一所縣學 右在縣城內，在西南五十步。其□堂，堂內有素（塑）先聖及先師□。^④

自唐德宗貞元二年（786）敦煌陷蕃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衆起義收復瓜、沙二州止，敦煌地區處於吐蕃佔領之下。此時吐蕃統治者廢除敦煌地區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推行其自身的落後的管理模式，從而造成敦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後退。敦煌地區的教育同樣遭受較嚴重的創傷，但即使如此，敦煌的教育亦未完全中輟，除了頗為興盛的寺學之外，亦有其他學校的存在，如：

P.4660 號《故沙州緇門三學法主李和尚寫真贊》下署：“宰相判官兼

^① 李正宇：《唐宋時代的敦煌學校》，《敦煌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39 頁；又，《敦煌史地新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173 頁。

^② 顏廷亮：《關於敦煌文化中的教育》，《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 年第 1 期，第 16—28 頁。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1 冊，第 53 頁。

^④ 同上書，第 24 冊，第 122 頁。

太學博士從兄李顥撰。”^①

P. 4660 號《沙州釋門都法律大德凡和尚寫真贊》署：“宰相判官兼太學博士隴西李顥撰。”^②

S. 779V 修補殘片上題：“大蕃沙州釋門教授和尚洪晉修功德，大蕃國子監博士竇良驥。”^③

李顥所讚的“李和尚”，日本學者竺沙雅章認為是“李惠因”^④。李惠因是 813—825 年前後統治敦煌的最高僧官——都教授。李顥是李惠因的從兄，則其活動年代當與李惠因大抵相當，亦當在吐蕃統治敦煌時期。S. 779 號之竇良驥，榮新江《敦煌邈真讚年代考》考訂為吐蕃與歸義軍前期瓜沙地區的文章家。李顥題銜為“宰相判官兼太學博士”，竇良驥題銜為“大蕃國子監博士”，如此則高明士所說“吐蕃佔領沙州以後將都督府學改曰國子監，其下設博士、助教或仍如往昔”、“州縣學不但沒有被廢，反而有特殊的發展”^⑤ 之說蓋為實情。

大中二年張議潮起義，建立歸義軍政權之後，廢除吐蕃政治、經濟制度，恢復漢唐之制，在承襲吐蕃寺學的同時，重建漢唐州、縣學制，敦煌的教育進一步繁榮。在歸義軍時期，敦煌增設“檢校國子祭酒”一職，專司轄區內的教育事宜，“開地方教育行政長官的先河”^⑥。而且李明振^⑦、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33 冊，第 52 頁。

② 同上書，第 33 冊，第 51 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1995 年版，第 2 冊，第 154 頁。

④ 榮新江：《敦煌邈真讚年代考》，附載於《敦煌邈真讚校錄并研究》（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4 年版），第 355 頁。

⑤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漢學研究》第 4 卷第 2 期，第 274—275 頁。

⑥ 同上刊，第 248 頁。

⑦ 李明振係張議潮之女婿，曾隨張議潭入京告捷，頗受重視，參看《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又稱《乾寧碑》，存莫高窟 148 窟前室南廂。參看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文錄及有關問題（一）》，文載《敦煌研究試刊》第 1 期，第 63—72 頁）及 P. 4615 號《李端公墓志》（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32 冊，第 180 頁）。

張承奉^①、張議廣^②等歸義軍高層人物均曾親自掛帥，任“檢校國子祭酒”一職，督導敦煌的教育，可見統治者層面對教育的重視。

就士夫層面而言，魏晉以來形成的張氏、李氏、陰氏、索氏、翟氏等名門著姓，作為敦煌地區文化的代表，與中原士族一樣，對於教育給予了很大的關注，不少人即親自參與其事。如翟氏家族的翟通“鄉貢明經”出身，貞觀十六年（642）時，任敦煌州學博士^③；其九世孫翟奉達，為歸義軍時期著名的學者和曆學家，曾任“檢校國子祭酒”^④、“沙州經學博士”^⑤。又如 S. 5448 號《敦煌錄一卷》載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張球年齡“已邁從心”，痛心於“經亂年多，習業人少”，遂於城西北“遂集後進，以闡大猷”，獻身於敦煌的教育事業。^⑥

與上述兩種現象相應，州學、縣學的記載較多地出現在此時的敦煌文獻中，如：

S. 2263V 《葬錄卷上并序》首題下題：“歸義軍節度押衙兼參謀守州學博仕將仕郎張思賢集。”^⑦

P. 2623 號《顯德六年己未歲（959）具注曆日并序》題銜：“朝議

^① 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之子，光化三年（900）被唐朝正式授予節度使旌節，任歸義軍節度使。文見《舊唐書·昭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第3冊，第768頁）。

^② P. 4660 號《張議廣邈真讚》（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讚校錄并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58頁）載張議廣結銜為“唐河西道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侍御史”，同時稱張為“衣冠盛族，聲震寰中。門傳將相，家處軍容”、“武經三略，矢穿九重”，可知張議廣乃勇猛悍將，自非等閒之輩。

^③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小龕外西側供養人題記，詳見《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敦煌研究院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頁。

^④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中央文殊師利變下彩繪發願文，詳見《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敦煌研究院編，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頁。

^⑤ 見 P. 2623 號《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日并序》題銜，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第16冊，第325頁。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第7冊，第94—95頁。

^⑦ 同上書，第4冊，第55頁。

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翟奉達撰。”^①

S. 4057V 題：“維大唐乾符六年（879）正月十三日沙州燉煌縣學士張。”^②

S. 1893 號《大般涅槃經》卷三七末題：“校了。經生燉煌縣學生蘇文頤書。”^③

綜上可知，從初唐到歸義軍時期，敦煌的學校教育雖有陷蕃時期的波折，但並未中斷，而且整體來說以興盛為多。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央、地方統治者及地方大族對教育的重視與扶植。

除此而外，普通民衆——作為社會的主體，也將子女的教育提到相當的高度。關於這一點，敦煌文書中不乏相關記載，如：

P. 2825 號《太公家教一卷》云：“良田不耕，費人功力；養子不教，費人依（衣）食”^④、“養男不教，為人養奴；養女不教，不如養猪”、“明珠不瑩，焉發其光；人生不學，言不成章。”^⑤

同號《武王家教》云：“武王曰：‘人命不等者何？’太公曰：‘世人由家有一錯、二娛（誤）、三癡、四失、五逆、六不祥、七奴、八賤、九愚、十狂。’武王曰：‘何名為一錯？’太公曰：‘養子不教為一錯。’‘何名為二娛（誤）？’太公曰：‘貪酒逐色為一娛（誤）；不擇師父（友），損辱己身為二娛（誤）。’”^⑥

S. 4307 號《新集嚴父教一本》云：“養子切須教，逢人先作嘆。”^⑦

S. 1920 號《百行章·序》云：“至如世之所重，唯學為先。”《學行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第16冊，第325頁。

^②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3冊，第429頁。

^③ 同上書，第14冊，第370頁。

^④ “依”字異本 P. 2564 號作“衣”，此據校。又，“食”字該號略有漫漶，此據 P. 2564 號補。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第19冊，第1、2頁。

^⑥ 同上書，第19冊，第3頁。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第6冊，第29頁。

章第卅四》云：“人雖有兒，不學無以成人。但是百行之源，憑學而立，祿亦在其中矣。”^①

S. 3393 號《王梵志詩一卷》：“黃金未是寶，學問勝珠珍。丈夫無伎藝，虛霑一世人”、“養子莫徒使，先交（教）慇讀書。一朝乘駟馬，還得似相如。”^②

P. 2418 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云：“人家男女，從小至大須交（教）禮儀。是男即七歲十歲已來，便交（教）入學”、“囑仙（先）生，交（教）文字，孝養禮儀須具備。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閑讀盡諸書史。”^③

雖然上揭著作並非全都由敦煌當地人撰作，但從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大量此類文書抄本來看，這些文本在敦煌地區廣為流行是不爭的事實。這些文本因其明白曉暢、淺顯易懂而深受廣大民眾的歡迎，人們的倫理關係、道德觀念及價值判斷等不少都來自這些俚俗文本，對普通民眾具有深遠的影響。而這些文本無一例外地都將育兒教子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勢必會對當地的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如上所說，中央到地方的統治者、高門貴族和父母對於教育都投入了較大的熱情，但對於兒童教學而言，這些畢竟是外圍因素，只能起輔助作用。那麼作為學習主體的兒童，對於讀書求學又是何種態度呢？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幾條敦煌文獻中的學郎題記。

P. 3441V 雜寫有：“白玉雖未（爲）寶，黃金我未雖（須），心在千章至（張紙），意在萬卷書。”^④

P. 3108 號《千字文》卷背學童詩云：“青清（青）河邊草，猶如水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委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1995 年版，第 3 冊，第 176、179 頁。

^② 同上書，第 3 冊，第 69 頁。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13 冊，第 308 頁。

^④ 同上書，第 24 冊，第 213 頁。又，P. 2622 號《吉凶書儀》背抄有相似詩句，作：“白玉（玉）非爲寶，黃金我未須，意〔在〕千張致（紙），心存萬卷書。”又，徐俊《敦煌詩歌殘卷輯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下編收錄 P. 2622 號此詩，注釋中提到長沙窑瓷器題詩亦有相近者，作“白玉非爲寶，千金我不須，意在千張紙，心存萬卷書”，可參。

上魚。男如不李聞（問），如若一頭烏。”^①

P. 2746 號《孝經》卷末學童翟颺庵^②題：“歲至庚辰，月造秋季，日逮第三，寫詩竟記，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其詩云：“讀誦須懃苦，成就如似虎。不詞（辭）杖捶體，願賜榮軀路。”^③

北 8442（位 68）號《百行章》文末題記云：“庚辰年正月十六日淨土寺李使（士）郎鄧保住寫記述也、薛安俊札用”、“庚辰年正月廿一日淨土寺李使（士）郎王海閔書寫、鄧保住、薛安俊札。”寫卷尾部下端用雙行小字抄學郎詩一首，云：“學郎身姓 [□]，長大要求人。堆虧急學問^④，成人作都頭。”^⑤

P. 2498 號《李陵蘇武往還書》文末題：“天成三年（928）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李幸思書記。”其後有李幸思題詩一首，云：“幸思比是老生兒，投師習業棄無知。父母偏憐昔（惜）愛子，日諷万幸（行）不滯遲。”^⑥

BD14636 號《逆刺占》卷末題：“于（於）時天復貳載歲在壬戌（902）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記。”其後有著者翟奉達所抄學童詩三首，第一首七言詩云：“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藝堂堂世上無。男兒不學讀詩賦，恰似肥菜根盡枯。”其後一首云：“軀體堂堂六尺餘，走筆橫波紙上飛。執筆題篇須意用，後任將身選文知。”卷末補記“幼年作之，多不當路，今笑，今笑！已（以）前達走筆題撰之耳。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21 冊，第 323 頁。又，該號卷背題“趙勝佳寫千文一卷，押衙申昌潤書機（記）”等字樣，此“趙勝佳”蓋即正面兩本《千字文》的抄寫者；卷背五言詩筆跡與正文《千字文》略近，蓋亦出自趙勝佳之手。又，相類詩句又見北 8347（生 25）、S. 8448C、S. 173、S. 6332 等卷，參看徐俊《敦煌詩歌殘卷輯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917—918 頁。

^② “颺庵”二字，李正宇錄作“颺颺”，不似，此據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局 2005 年版）該號之敘錄（第 407 頁）改作此形。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18 冊，第 55 頁。

^④ “急”字原卷字形過小，不甚明晰，俟再校。又，“問”字徐俊《敦煌詩歌殘卷輯考》（中華書局 2000 年版）錄作“得”（第 920 頁），不似。

^⑤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110 冊，第 331 頁。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5 年版，第 14 冊，第 335 頁。